

颠覆男权传统的话语

——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三大学派

李小林

(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营造自己的理论过程中,通过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借鉴、批判、改造形成多元化的理论格局。其中最主要的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从纵向看,这些学派表明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从横向看,则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总体特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走向是和后现代主义相融合,并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中发展自身的理论。

[关键词]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1)01-0055-06

A Discourse That Overturns the Patriarchal Tradition ——On Western Feminist Criticism and Its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s

LI Xiao-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bination, critic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psychology, anthropology and other subjects, feminist criticism has produced, in its process of theoretical self-construction, a pluralistic pattern among which the Marxist, psychoanalytic, and de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riticism is examined in these approaches in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its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in a synchronic one. The tendency of the feminist criticism is therefore a fusion with postmodernism, its own theories being constantly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i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feminist criticism; Marxism; psychoanalysis; deconstruction

—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种各样全新的批评理论出现于西方文论史上,心理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五彩缤纷的理论界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如同20世纪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高节奏、高速度发展一样,各种新的批评理论在活跃了十几年、几十年后,或者走向了衰微,或者又被更新的理论所替代。20世纪中叶,女性主义批评以异军突起之势,迅速地成为一种更新的批评理论风靡了欧美的批评界,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局面。女性主义批评对于性别、种族、阶级等多重角度的批评方法突破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范围,动摇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定型论,并成功地导致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对过去的若干定论产生根本的怀疑。为此,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称道说:“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当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1]

女性主义批评(又译为女权主义批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它还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产生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场妇女解放运动以呼吁探求妇女获得与男子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为主要特征。男女平等问题从资产阶级人权运动以来,一直是妇女解放的奋斗目标,然而直至20世纪前期,这个问题仍被局限于妇女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上。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妇女的工作权利、选举权利、教育权利。在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的女性主义者则明确认为,妇女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决不意味着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定型论”。妇女在生理、心理、潜意识等方面仍受到性别歧视,这种歧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学上都能反映出来。因而,建立争取妇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批评,成了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愿望。

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是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她一生都贡献给争取妇女权利的事业。1949年,波伏瓦出版了《第二性》一书,最早从性别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有关女性的若干理论问题,其中许多观点都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所沿用和继承。该书奠定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础,被誉为“女人的圣经”。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过程与女权运动的三个阶段大体吻合。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女性主义批评以社团组织为形式,以宣言声明为喉舌,以揭示性别歧视为主要内容,以争取男女平等为目标,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政治斗争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女性主义批评从强调男女平等转为承认男女性别差异,进而强调女性心理的独特性,集中考察欧美女性作家的文学现象,策划构建女性主义文学体系,以此与男权中心的文化相对抗。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转向从理论上勘探女性主义本质、特征、写作信仰及表现形态等诸多问题,这既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建树,又是对前期运动的反思和总结。在这三个阶段中,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任务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要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些新的准则来与既成的对女性歧视的社会准则相抗衡,从而彻底动摇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定型论”。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批评实践上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则是在对传统的批评工具和价值观念根本否定的前提下,一方面,对现存的文学史进行重新解释,从确认妇女经验的正确性的角度来发掘一个已被遗忘的文学史;另一方面,对男子与妇女在文学传统方面存在的差异,诸如经验、想像以及各自选择的艺术类型、意象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的探索。

二

如同其他批评一样,女性主义批评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构造自身的理论。虽然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并不重视理论的建设,甚至还有人(如伊丽莎白·米斯)认为理论属于男性话语形式,难以摆脱传统的性别定型论,但大部分批评家还是不断进行理论的探讨。女性主义批评在营造自己的理论的过程中,往往把触角伸向其他学科,它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寻求与自己的主张相切合的理论,或适合自身的方法论,并根据需要对之借鉴、批判、改造,从而建构了带有各种不同学科特征的批评理论。于是,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出现了多元化状态。在诸多的女性主义批评学派中,最具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理论的吸收借鉴或批评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可以说是这几种理论在女性主义话语中的逻辑延伸。

对女性主义批评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极易被接受的理论。尤其在初期,女性主义批评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此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以及关于妇女解放的学说,都很适合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口味。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并非指仅仅引经据典地利用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观点的学派,它是泛指任何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例如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影响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派，同时，它还包含着另一种情形，即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思想所进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论的探讨。20世纪60年代是这一学派的形成阶段。当时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为争取妇女与男子真正意义的平等，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汲取了许多精华，诸如要铲除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以及反对阶级压迫等。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盛行于英国，一些妇女研究的刊物如《妇女斗争》、《大火焰》等，强调只刊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政治性的文章，著名批评家朱丽叶·米切尔开设的有关课程的宗旨便是“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2]。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许多观点提出探讨的理论越来越多，许多批评家还把眼光跳出妇女地位由经济所决定的框架，从生理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并开始从事有关性别理论的研究。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得到了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家除了朱丽叶·米切尔，还有美国的戈尔·卢宾。她们两人的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进行探索的基础上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是指女性主义者在批判和借鉴现代心理学成果，尤其是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女性主义批评。该批评“将女性写作的差异纳入作家心理和性别同创作过程关系的范围。它关于女子心理或女子自我的理论吸收了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性别差异模式，所谓女子心理或自我是由身体、语言的发展及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性别角色形成的”^[3]。也就是说，该学派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考察女性的身体、语言、欲望等潜意识层面，探讨女性和语言、女性与写作的关系，从而形成自身的特色。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最流行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焦点从强调男女平等转为承认男女性别差异，女性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接受男性的符号秩序，赞美女性，强调女性心理的独特性。从这一角度出发，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者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中的“阳物崇拜”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进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作了彻底的否定。吉尔伯特和格巴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批评家也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又常常无法跳出精神分析学的窠臼，譬如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反驳“阳物崇拜”的同时，提出了“子宫崇拜”的说法（法国女性主义者也有此说），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精神分析学的一种变体。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主要借鉴的是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语言和欲望的有关理论，试图创建“女性写作”理论。西索的《美杜莎的微笑》和克里斯蒂娃的《诗的语言革命》，都阐述了根据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来建立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写作理论，从而与传统的男性价值体系相对立。

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的。这一学派借鉴了解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的产物。解构主义以对语言的解构入手，从而达到颠覆传统文化的目的，所以它着重对“菲勒逻各斯中心”（即男性语词中心）的传统进行了消解。这也成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方针。由于解构主义开始盛行于法国，所以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最早接受解构主义，西索、依利加芮、克里斯蒂娃也都是这一学派的代表。随着解构主义影响的扩大，美国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也有较大发展，佳·查·斯皮瓦克是美国这一学派的中坚。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宏观上吸收了解构主义反对一切宏大理论、反对神秘化、反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有关主张，对过去的女性主义进行了反思，对代表传统文化的“菲勒逻各斯中心”进行了消解，把研究的热点从大一统的理论分野转向了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的理论探讨。同时，它在具体理论上又吸收了解构主义的反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观点，提倡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它还采用了解构主义的“一切皆文本”和“互文性”的观点，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从而构成了这一学派的理论特征。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还有“人类学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等理论派别。从纵向看，上述三大学派恰好表明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体现出其理论逐渐深化成熟的

趋向;从横向看,它们则自成体系,几乎涵盖了整个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总体特征。

三

从上可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是在女性主义批评初期和中期形成的学派,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学派的生成要晚一些,它们确实表明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变迁轨迹。三大学派间既有区别,又有同点,彼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显然不同。前者是一种联系社会背景的研究方法,后者则是一种非社会背景的方法。从社会背景出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并补充之,形成了“性别理论”;从非社会背景出发,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在批判利用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女性写作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在讨论性别差异时,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经济等概念同女性主义的性别概念结合起来。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则重视文学与性别心理的关系,试图对女子与语言、创作的关系作理论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是人的意识层面,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是人的潜意识层面。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则对这两种理论都进行了反思,在消解大型理论的同时,又用“互文性”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这两种本来互不相容的理论融合于本文性的分析中。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研究本文性的理论家们将马克思读作一位以世界(历史与社会)为对象的理论家,读作一篇有关生产力和生产——流通——分配的本文;将弗洛伊德读作一位以自我为对象的理论家,读作一篇有关意识与潜意识的本文。……所有这一切全部缠绕于一种‘互文性’内。”^[4]

上述三大学派在理论来源、研究角度和方法论上虽有差别,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三个共同点。

一是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颠覆意义。由于女性主义批评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视历史传统,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肯定妇女经验的正确性,并指出其政治意义。所以,女性主义批评既要把矛头指向传统的属于男性中心文化的理论,批评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论;又要在各种具有批评传统价值观念特点的理论中寻求支柱,武装自己,营造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吸收了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着明确的反抗压迫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又从其他学科中借鉴优秀成果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了批判精神。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在对弗洛伊德、拉康的阳物崇拜学说展开猛烈抨击的同时,吸收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在潜意识层面批判了男尊女卑思想。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则从颠覆语言入手,进而达到颠覆传统文化的目的。这三大学派有着共同的冲击目标,那就是男权文化传统。

二是理论的交叉性和模糊性。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不注重系统性,它往往有着“实用”和“综合”的特点,所以有时会显得不易界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最初比较遵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性别理论,实际上是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探求的结果。它们已不是那种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有着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特征。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哲学派别,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加女性主义组合而成的社会科学学派,而是带有马克思主义印记的女性主义批评学派。同样,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并非接受了精神分析学说,相反,它对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内容——“阳物崇拜”还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它注重人的心理分析及潜意识层面的探讨,这也显示出它是属于带有精神分析印记的女性主义学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更由于解构主义原则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轮廓不清,以及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性质。

三大学派在理论上的交叉性和模糊性还体现在其成果的构成上。许多批评家为完成女性批评任务，常常会借鉴几种不同的理论，从而体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性质。这种情况最早可以追溯到女性主义批评奠基人波伏瓦，她在《第二性》中肯定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关妇女的若干理论，并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补充，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但在同一本书中，她对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精神分析学作出了反驳，并提出女性是“雌性”和“他者”的一些论断，显示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色彩。以后的批评家中此类情形也屡见不鲜。英国的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又作了大量的修正。米切尔在该书中也向弗洛伊德、拉康发起了责难，并由此阐述了女性记叙体的问题。她的理论同样有分属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两个学派的部分。法国的克里斯蒂娃固然属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学派，但她同样热衷于解构主义，她本来就是解构主义语言学家、哲学家，后来又成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之一。美国的斯皮瓦克更是如此，人们常给她冠以“解构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第三世界批评家”等种种头衔，这也正说明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跨学科、跨学派的性质。正如伊丽莎白·米斯在探讨三大学派在理论上的这种模糊性和交叉性时所说的：“我们有必要把女权主义批评乃至一切批评构想成绝不固守一个中心的无限进展，因为它总是非中心的，自我置换和自我对立的。再说，因为不可能决定边际和圆周，也就不可能有中心。”^[5]

四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一种始终处于动态的理论，至今仍在发展和流动中。女性主义批评从形成之日起就是在否定前人的理论中前进的。它不但要颠覆传统的文化，而且也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在颠覆与反思中，女性主义批评走过了三四十年的历程，直到现在，它仍是一幅未完成的自画像。它没有统一的理论根据、没有统一的目标，关于它的所有的界定都只是暂时的、可变的，而且是具有模糊性、交叉性的。特别是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看来，女性主义批评已从大型理论的建构转入局部的、单一的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内部意见分歧、各行其事，似乎失去了目标。但如果深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批评理论的发展走向有着两种比较明显的趋势。

一是女性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融合，进一步解构传统文化。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这一学派出现后，以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形式为理论特征的女性主义批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虽然没有女权运动，也没有系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但由于吸收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在文学实践和批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批当代女作家如张洁、张辛欣、陈染、林白等，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女性意识和女性思想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她们首次真正以女性主义话语进行创作，反思中国的妇女运动，质疑全部文化传统，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不再停留在政治上争取男女平等的初始阶段，而是促使人们开始进一步思考女性问题。有的女作家还对男女性别差异问题提出了“中性”的观点：“中性是一种删削和简化，整个人类返朴归真，男人和女人大踏步地逼近终极的窗口，缩写为大写的人，抽象的人，纯粹的人”^[6]。这番话颇有几分接近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双性共体”概念。总之，女作家们的的确确在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扭转着人们对女性的看法。

二是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将继续努力建构综合性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从产生起，在是否需要一种理论的问题上就聚讼纷纭。有不少批评家致力于把其他学科的精髓纳入女性主义话语，建造理论，原因有二：一方面，完成女性主义批评任务需要理论武器；另一方面，让女性主义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进入大学课堂，也特别应有系统的理论。但是，也有一些批评家反对理论。伊

丽莎白·米斯就觉得理论建筑隐伏着危机,她认为,男性中心文化始终企图把男性的理论结构强加给女性主义批评,热衷于理论就容易落入男性中心文化的罗网^[5]。意见虽然不同,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却不断在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就连米斯也不得不承认没有理论也是不行的,那将被排斥在现代批评之外^[5]。而构建综合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批评家们过去曾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今后还将继续这种努力。伊莱恩·肖沃尔特是美国最致力于此项工程的批评家之一,她的《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对当今建造综合的理论影响很大。肖沃尔特吸收了生物的、语言的、心理的观点,又将它们放在生成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中研究,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史学方面提出种种女子文化的假说,这可以说是建构综合性理论的典范实践。

当一些批评家忙于消解大型理论之时,另一些批评家却重视建构综合性理论。这看起来似乎相悖,其实并不矛盾。首先,女性主义批评继续构造的理论已非前期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而是历史主义的。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女性主义批评反对过去的宏大理论,并不等于它彻底排斥“理论”,它所反对的是那些理论的所谓“总体规律”,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差异”。女性主义认为,理论“应当反映出事物的暂时性,应当把‘现代男性父权制核心家庭’一类具有历史特色的制度性概念,摆在比‘生殖’、‘母性’一类非历史的功能主义概念更重要的位置上。^[6]前者是一种多元的综合建构的社会认同概念,而后者只是单一的“性别认同”概念。当然,女性主义并非不要“性别”概念,只是认为应当将它当作许多概念——诸如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等——中的一种;将其纳入发展的、使用历史话语的、具有文化特色的范畴^[6]。其次,这个理论在批评方法上将充分体现出多元化的原则。美国的“身份”批评即是一例。“身份”批评家主张任何作者、读者和评论者都应带有“身份”特点从事写作、阅读或评论,从而在观点、角度以及文学的再现上留下“身份”的烙印。而“身份”则是由他们各自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阶级、社会政治和个人因素混合形成。这样的“身份”批评必然是多视角、多文化、多学科的。再次,如前所述,女性主义批评任务需要理论武器。正像南茜·弗雷泽和琳达·尼科尔森所指出的:“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后现代的批评既不要放弃大型历史叙述,也不需要放弃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这一点对女权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性别主义有很长的历史,而且在当代社会仍旧影响深广。因此,后现代女权主义不必抛弃为论述大型政治问题所必需的大型理论工具。”^[7]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史来看,我们大约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描述其轨迹: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女性主义批评只有在不断解构中建构其理论,通过借鉴、反思来寻求新的认识,才能扩大研究面,深化其理论。”

[参考文献]

- [1]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M]. New York : First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82.30.
- [2] 阎冬潮.妇女研究在美国、西欧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A].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 [M].北京:三联书店,1995.187—194.
- [3] Elaine Showalter.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M]. New York : 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1985.256.
- [4] 佳·查·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 [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00—305.
- [5]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29,105,105.
- [6] 毕淑敏.毕淑敏作品精选 [C].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117.
- [7] 南希·弗雷·琳达·尼科尔森.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 [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選 [C].北京:三联书店,1997.141—148.